

为热带人语冰

——我们时代的文学教养

郅元宝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为热带人语冰

——我们时代的文学教养

郅元宝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热带人语冰：我们时代的文学教养 / 郜元宝著 .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4
ISBN 7-5320-9471-5

I . 为... II . 郜... III . 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34319号

为热带人语冰

——我们时代的文学教养
郜元宝 著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编：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40,000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本
ISBN 7-5320-9471-5/I·51
定价：(软精) 14.00元

等待新的文学

“自觉”时代的到来

——自序

按理说,在文学低谷谈文学总有点不合时宜,但我这本小册子恰恰是要揭示那些不愿谈文学的人下意识中对文学的理解,我认为正是这种理解文学的方式和文学的衰落有关。文学的衰落不是某种外部突然降临的事件,而是我们内在生活变化的结果,照宋儒说法,这原是“己分内事”,为何避而不谈?

很多人把当代文学“轰动效应”的丧失和文学的边缘化视为文学的堕落,我开始也同意这个说法,但进一步的思考终于促使我将自己的思想矫正过来。当代文学的衰落、边缘化和失去轰动效应,可以从多方面解释,但一个更加重要的方面被大家忽略了:当代文学的失败不是一小撮作家们的失败,不是“他们的文学”的失败,而是“我们的文学”的失败。中国一大批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在20世纪90年代离开了文学,他们把文学的失败当作一小撮作家们的失败、“他们的”失败,没有把它当作“我们的”失败;他们认为文学的失败是“他们的”经验而不是“我们的”经验,批评、哀叹、贬低之声此起彼伏;通过批评、哀叹和贬低,他们把自己和已然失败或早就失败的文学区别开来,或干脆弃置不顾,正正规规做起学问来了。文学在90年代扮演了一个被抛弃者的形象:首先是社会大众抛弃了文学,随后是曾经和文学共同走过一段路的知识分子抛弃了文学。曾经是“我们的文学”,现在被陌生化、他者化,被当作一小撮作家们的文学即“他们的文学”了。在这过程中,知识分子又要了一个花招,再一次把失败的经验推给别人,自己则绕过文学这艘沉船



寻找新的生路去了。这一回，他们似乎又成功——又阿Q式地转败为胜了。

但现在这种“新状态”恰恰要我们自己来承担而不是要我们聪明地甩掉的一种经验。80年代，我在一片乐观的歌声中加入到文学行列中来，被文学潮流推动着，觉得文学是一个有前途的、荣耀的职业，是全民族参与、表现全民族精神的职业，所以我要从事文学——和许多人一样，我轻易获得了这种参与者的身份。90年代，这种东西忽然被剥夺，文学一下子成了灰姑娘。80年代文学很红，它是整个人文精神体系的一个佼佼者，一个杰出的演员，大家趋之若鹜，都要搭这个便车，90年代文学衰落了，像冰海沉船一样，每个人都想跳离它——但恰恰这时我发现我们很可能又做了一次势利鬼。两个年代的文学的概念都是把文学当作一种时尚，不同在于前者是当令的时尚，后者是过气的时尚。把文学当时尚，或者是英雄要做的事，或者是“壮夫不为”之事。80年代，有才能的人都搞文学，90年代，有才能的人都不搞文学，看起来很不同，其实一样：都没有把文学当作承担者，在文学中承担某种东西，只愿在文学中分享英雄气，不肯在文学中承担失败的经验。大家在90年代文学的失败中溜之大吉，这难道不已经充分暴露了知识分子对文学的浅薄理解吗？

如何思考文学在整个知识分子事业中的地位？如何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本质和功能？如何思考当前文学的失败以及“五四”以来文学的一系列相同或不同的失败与我们长期以来所执守的各种文学观念的关系？这是我近四五年来面对的一个中心问题。这本《为热带人语冰——我们时代的文学教养》记录了这种思考的结果。

这本书将要讨论如下问题：1.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文学性智慧和非文学性智慧的分裂如何从内部制约着文学的发展？2. 现代中



国文学和学术究竟处于怎样一种关系状态,二者扮演的文化角色有什么不同?3.当代文学在90年代的整体失败为什么竟然会导致某种学术的“繁荣”?学术的“繁荣”与文学的“失败”如此鲜明的并置意味着什么?4.我们的文学教育长期以来如何巧妙地以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权威化设计抽空了读者的具体阅读经验?应该如何反抗这种对文学阅读的非文学规训?5.所谓“文学必须介入现实”的命题当真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吗?6.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过分看重文学的“价值”是否会侵害现代文学的最高理想——鲁迅所谓的“白心”?7.中国现代文学本来以注重精神为出发点,为什么很快就落入了中国文学自古以来身体诉说的传统?身体如何进入我们的现当代文学?8.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有没有一种资源可以发掘出来,帮助我们重新争取一种文学的自觉——至少帮助我们重新确立文学者的基本立场?

90年代文学衰落的同时,各种理论、学术进入精英文化中心,文学研究者都想成为学者、思想家了。我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发现,鲁迅处理文学和学术的关系时有一个和同时代人完全相反的姿态,他非常重视学习者、失败者、思考者的文学、被压迫的奴隶的文学,始终厌恶和警惕体面的绅士或成功人士的学术(不仅警惕国家学术,也警惕学院学术),我从这中间总结出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分途的结论:在鲁迅一生的追求中,存在着“文学”和“学术”的对立,对他来说,“文学”是有特殊含义的,它是承担者的语言,不是英雄的标语口号,而学术则是不愿承担者、不肯承认自己就是阿Q的人的装饰,是急于寻找策略、方案的那些“英雄”、“志士”、“伪士”、“抡才小慧之徒”的宝贝。文学要人忍受,要人低头,甚至要人“朦胧”。我由此发现了一个在今天还大有阐释空间的文学



和学术的对立。

我也由此获得一种自觉,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学者。学者的使命是要做大学问,这是许多人的幻想。竹内好把鲁迅的文学和启蒙分开来,我根据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认为有必要把文学和学术区分开来。我一直在提一个被大家都忽略的问题,本书的中心就是这样一种追问:在学术普遍繁荣的今天,在国家进行大量投资、教育结构不断“完善”、博士不断产生、“博导”不断被授予的情况下,在建立学术规范、和世界学术接轨的集体“烦恼”中,文学差不多已经成为一部分没有文化的人的自娱自乐,成为“他们的文学”、年轻人和少年甚至孩子们的文学(不是已经成立了“中国少年作家协会”了吗?),而我的问题是,如果一个时代仅有学术“繁荣”而没有文学的自觉,这时代的整体文化将很值得怀疑。鲁迅写过一篇杂文《算账》,说“乾嘉学派”被“五四”的国故整理者们吹得天花乱坠,但这是有代价的:他们用学术换来了对现实不说话。顺着鲁迅的思路也可以算一笔账:当学术书汗牛充栋而文学书被挤到角落时,当文学变成“他们的文学”、学术反而变成“我们的学术”时,这时代的总体文化将极其糟糕,而我们大家竟然熟视无睹,甚至正舒服地享受着学术“繁荣”带来的“好处”。我们都是文学的背叛者。

大概1998年前后,北京的某学者——他原是红学家,不知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国学家——主持出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搜罗了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吴宓……很多人的著作,也包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大概认为那是鲁迅的学术著作,但可惜太薄,于是就把鲁迅和戏曲学家吴梅放在一本书里。这引起了李慎之先生的震怒,认为他不配讲现代学术,因为现



代学术是研究现代中国的学问,既然这样,还有什么比《阿Q正传》更有资格成为现代学术经典呢?李慎之这篇文章写得极好,可惜许多人仅仅把它看作一种牢骚和幽默了。

在文学的失败无人承担的同时,我目睹了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对学术繁荣的欢呼、对其实并不怎么辉煌的现代学术传统的追认。20世纪90年代,我们一方面讲鲁迅的反抗精神,讲顾准的独立思考,讲张承志的不肯妥协,另一方面,也正是那些神话鲁迅、顾准、张承志的文坛“豪迈派”、“慷慨党”们在为“学术繁荣”添柴加火。于是陈寅恪出来了,冯友兰、季羨林、金岳霖、熊十力……都出来了,中国现代的新史学、新儒家,全出来了。与此同时,新一轮的西学热潮也开始了,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后历史主义、第三世界理论接踵而至……在学术的合唱中,文学被日益显得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再一次抛弃、再一次出卖了,对学术的欢呼巩固了对文学的遗忘、巩固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隔膜。我很感谢普鲁斯特的一个说法,他说,学术,或者理性,一直享受着不配享受的皇冠,但这个冠冕应该被摘下来,理性惟一的好处就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反思亲手把这顶不该享受的冠冕摘下来。这句话正好可以借来做我对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的观察。我不认为我是个有学问的人,但我可以做一个观察者,我想摘下这顶理性的冠冕,重新使人们回忆起文学的本质——首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本质。

说到文学的重要性,您当然可以提问:什么样的文学?现在关于文学的多元化解释似乎已经成为不可摇动的定论,我只想强调一点:文学可以不必如当前那样狭隘,文学也无须当前流行的那般无谓的精巧和烦琐。已经有不少人指出,中国所谓“纯文学”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原本是各种压抑性和诱导性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那



么,就让我们将文学的视野再展开一点吧:文学完全可以不必等于某种时行文体,完全可以不必等于在某个时期唱主角的诗歌、小说或散文。文学包括这一切却不能被其中某一项所包括。文学应该更加宽阔而自由,应该类似鲁迅所谓的可以“直言其事实法则”的“文章”:可以直接说出心中本有的内容,而不必是那种转了无数个弯子最后连出发点也丢掉了的自以为精妙无双的摆设。鲁迅曾经担忧中国人因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喜欢奇技淫巧、不肯直接爽快、偏爱故弄玄虚舍近就远以艰深文其浅陋的毛病,所以总有一天会发展到和自己过不去的荒诞地步,比如“农夫送来一粒粉,用显微镜照了,却是一碗饭;水夫挑来用水湿过的土,想喝茶的人又须挤出湿土中的水”。他所担忧的,至少在目前有些作品中,也包括在那些一脸俨然的所谓人文社会科学和“××学”中,已经应验了。解救的办法,只能反一反,“直言其事实法则”,“放笔直干”,而不是照着某种时新的样式描红,非要符合某种文学“理想”不可。我们缺少的是直接爽快的书写和说话,至于当前这种文学,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

这本小册子也充分暴露了我的尴尬,我似乎正在用自己的逻辑来攻打自己。想了这么多,再回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中去,确实很难办:我如何在评论文章中实现自己对中国文学的上述思考?我自信可以把观念性问题讲清楚,但碰到实际的文学就讲不清楚了。但我也不想讲清楚,因为这恰恰证明我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失败论的理解是对的:中国现代文学不是可以让我们分享成功的工具,而是逼迫我们承担失败的某种境遇和空气;对文学的自觉,不是让我们把现实说清楚从而驾驭现实,而是要我们在还不能完全理解现实的时候进入现实,在尚未找到万验的灵丹妙药之前



敢于将自己投入现实的冒险。以后的文学评论会很难,但这或许是个不该回避的挑战:就让我们继续在文学和语言中反省仍然不会结束的失败的经验吧。

可惜作家们都很自信,他们不得不受到我曾经分析过的现代中国思想的负面影响(我把这一倾向概括为不肯承认失败的阿Q主义),在他们的作品里,看不到思考和语言的真诚失败,不能从中打开缺口窥视并亲近他们的灵魂。在浩大的不断失败的潮流中,曾经得到小小成功的当代作家们竟然都变成不肯承认失败也无法占有失败的经验刀枪不入的胜利者!我以后或许只能做一个讨厌的酷评家,专门寻找他们的败笔并从败笔中拷问他们的诚实和判断他们的才能了。我还是对中国思想和文学中失败的经验最感兴趣。

2004年2月25日晨

目录

自序 等待新的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智慧偏至论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分裂 ····· 1

“扶东倒西”几时休？

——近年学界思想变迁及其与文学衰落之关系 ····· 21

为热带人语冰

——我们时代的文学阅读与文学教养 ····· 33

“科学”、“神思”、“本根”及其他 ····· 47

中国小说还能走多远？····· 67

散文的心 ····· 71

离开诗

——关于诗篇、诗人、传统和语言 ····· 78

二马之喻和冰之喻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之分途 ····· 95

文学家的基本态度	
——从竹内好的鲁迅论谈起	124
从舍身到身受	
——有关鲁迅著作中的身体语言	141
“价值”的大小与“白心”的有无	
——也谈现代文学研究新空间的开创	179
徘徊在博尔赫斯与高尔基之间	
——浅析“文学必须介入现实”	193

智慧偏至论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分裂*

1959年,英国小说家C.P.斯诺——他也是科学家——发表过一篇讲演叫《两种文化》,¹掀起轩然大波,斯诺因此也有机会也有必要不断扩充起初的想法,最后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两种文化》。

斯诺认为当时英国出现了“两种文化”,即“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和“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代表这两种文化的人,他分别称之为“文学知识分子”(literary intellectual)和“科学知识分子”(scientific intellectual)。他说在英国皇家学院以及剑桥、牛津大学,这两拨人见面都不说话,互相瞧不起。他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他的全部想法就围绕这个严重的问题展开。

英国人说话的特点是比较从容,我们中国人说话一般都很急切,这大概是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和经历过长期殖民地半殖民地之苦的东方后发的现代国家知识分子的区别之一。斯诺的书写得并不精彩,好处可能就是那种英国式的从容,但我觉得他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斯诺反复申说他的观点,思想上并无多少推进。尽管如此,他提出来的问题还是根本性的。他认为由于“两种文化”的分裂,导致整个国家知识分

* 2003年6月13日,笔者应王鸿生、王光东教授之邀,为上海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班做题为“两种智慧”的讲演,谢润宜小姐细心整理了录音稿,本文即在她录音整理的基础上加工而成。



子不能心平气和坐在一起切磋琢磨，不能互相从对方那里得到有益的启发，知识分子在智慧上蒙受了莫大损失，创造力也急剧减弱，而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潜伏着一种危险，即知识分子的传统不能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有任何制衡作用，整个社会陷入了“科学知识分子”盲目乐观的浅薄空气中；反过来，科学发展的意义也不为“文学知识分子”所了解，“文学知识分子”日益固陋，满足于封闭陈旧的知识与价值系统，跟现代社会越来越脱节，变成一批国家豢养的有学识的冬烘先生。

我现在就借用他这个说法，谈谈自己对当代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的观察。

但我要讨论的不是知识分子以及文化的“文理之分”，而是斯诺所说的“文学文化”与“文学知识分子”的某种内在分裂。我觉得现代中国一直存在着这种分裂，现在更是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斯诺所谓的“文学文化”在我们这里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趋势。“文学文化”内部的分裂对我国整体文化造成的伤害，未必小于斯诺所谓“两种文化”的分裂对西方国家整体文化的危害。

斯诺回应别人的批评时说过，一时代文化诸要素和知识分子群体相互的区别，细分起来不可胜数，但他认为从宏观着眼，这些区别又都有类可归，归纳为两种、三种，都未尝不可，主要看归纳者的立场与角度。他说得很实在。我初步把中国目前从事文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知识分子分成两类：一类是“文学性知识分子”，一类是“非文学性知识分子”。这种分法也许和我主要从事文学研究的职业有关，但我最终的想法并不局限于文学，因为所谓“文学性”与“非文学性”，我下面将详细加以解



说,并不局限于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而是指两种不同的智慧形态以及相对应的文化形态。

斯诺说他的两分法很危险,把人分成两组,容易挑起事端,我想我的两分法也会遇到危险,但没办法,我总不能把自己看到的现象故意隐瞒起来。关于中国当代文化及知识分子的分化,论者很多,大家从不同角度看到了不同的分化,比如“体制内”与“体制外”、“新左”与“自由主义”、“激进”与“保守”、“国际化”“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之类。“五四”以来,知识分子阵营的这一类分化的现象始终浮在表面,吸引着文化观察家与批评者们的注意力。相比之下,我所谓“文学性知识分子”与“非文学知识分子”之间的分化,也许最不起眼,但最不起眼的存在往往隐蔽得最深,作用力最持久,正如痼症、顽症,往往都是隐患、暗疾。

文学性/非文学性的划分依据,主要不是知识分子所从事的职业,而在于他们的思维形态、智慧形态。在作家队伍里,在同样研究文学的知识分子内部,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非文学甚至反文学的倾向,这些倾向恰恰属于“非文学性知识分子”。

比如,某些文学研究者毫无文学修养和鉴赏力,我就见过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他们的形象、气质与文章样式,看上去和他们所研究的对象毫不沾边,说他们是杀猪的、开机器的,恐怕更能让人们相信。

我也认识一些作家,不错,他们有很好的文学修养,文字工夫很过硬,其小说、散文与诗歌甚至产生过或正在产生极大的影响,但我还是很难把他们归入“文学性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全部文学活动所依靠的智慧形态与思维形态是非文学的,他们



对生命、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也都是非文学性的。他们写一部小说，一篇散文或一首诗歌，最终目的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社会应该怎样发展，而不是启迪人们与这个世界建立某种想像性的复杂而丰富的关系。文学在他们眼里只是影响人的手段和技巧，他们真正要贡献给社会的货色是一整套改造社会的“锦囊妙计”。他们不认为这个世界的本相是虚空，是混乱，是目标不明确的一个航程，他们认为单靠他们的理性力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赋予世界以意义、以秩序，条件是必须授予他们一定的权力，公众必须信服他们的说教，必须接受他们的目标为自己的终极关怀。他们总喜欢把文学和“崇高”联系起来，而不是和美联系起来；总喜欢在文学中显示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而竭力避免迷惘或沉醉。他们与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说的那些容易做官、愿意做官也很会做官的“科学家”同属一种类型。他们和某些“科学家”一样，都天然地亲和无论粗暴或文雅的政治家，而不像鲁迅所说的文学家那样总是和政治家走在无法靠拢的“歧途”。他们的职业是文学，也披了一件很不错的文学的外衣，但骨子里的东西并不是文学性的。

从来给“文学”下定义都很困难，何谓“文学性知识分子”，我也只能靠举些例子来说明。比如我心目中比较佩服的一些作家、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就属于“文学性知识分子”。像海涅，如果你们读过他的《论浪漫派》、他对《唐吉珂德》的研究（确切地说是长期阅读这部小说的某种方式）以及《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那篇长文，你就会发现海涅这人多么有趣。他是诗人，但他处理的问题是整个时代无所不包的学问：德国的哲学、宗教、政治、文学，这一切和法国的区别（他当时住在法国，以法国



读者为对象),等等。他非常自由地运用他的知识。海涅在知识等级上不亚于德国当时一些专门学者,但德国当时一些专门学者未必承认海涅是学者。我的意思是,海涅能够自由运用他的或者很丰富或者并不丰富的知识来自由地讨论他那个时代的问题,而学者只能用高度限制性的语言说话。“文学性知识分子”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在运用知识时不讲门派,不讲谱系,甚至不讲方法论的严格的分野,能够比较自由地运用知识。他对知识的“占有”也是自由的,他的知识不是通过学院长期封闭的训练得来,他的知识没有打上张老师或李教授的明显印记。他的知识是自己获取的,和他的生命密切联系在一起,借用胡风爱用的一句谚语,叫“拔起萝卜带出泥”;他的知识和他所经历的时代与生活的丰富细节息息相关,和他个人的思索非常靠近。知识不单单是思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也是他生命体验的一部分。

我也很佩服赫尔岑,他的《往事与随想》本来是一本回忆录,可那里面讨论的是当时俄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几乎所有问题。他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宗教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和文学问题,视野非常开阔,话题转换也非常灵活自然。那些高深的问题到了他手里就变得家常亲切。他未必能解决那些问题,但至少成功地帮助你消除了和那些问题之间容易产生的隔膜,而一般知识分子正喜欢制造隔膜,从而显得高深莫测,似乎他们天生就有垄断这些问题的权力,他们很难和一般人打成一片,他们的文章也不是写给一般人看的。赫尔岑还有一篇文章也很有意思,叫做《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我读书的时候很多老先生都曾向我推荐,可惜当时看不懂,觉得这么随意地用